

民主化的不確定性與地方派系的調適： 臺灣地方派系研究的發展與展望¹

翁立紘*

摘要

綜觀過去 20 年地方派系的研究，往往非以派系政治做為主軸，而是鑲嵌於其他議題研究，諸如威權統治模式、社會網絡、組織動員、政治民主化、政黨運作與競爭等。雖然如此，過去的研究途徑上仍可簡略區分為「恩庇侍從」及「社會網絡」兩種型態。本文將針對此兩種型態的地方派系研究進行區分及回顧，並進一步討論發展已久的兩種理論途徑在經歷民主化與兩次政黨輪替後的臺灣是否仍然適用？

本文認為，過去「恩庇侍從主義」主張派系的形成係「由上而下」，並為了其利益極大化而存在，此種縱向關係已在多黨化的政黨政治競爭中，由於派系難以找到穩定代理人的情況下增添了諸多不確定性；「社會關係網絡」則認為派系的發展係「由下而上」，並是建構與維繫此一關係網絡而存在。此種觀點在地方派系的權力運作模式於民主化後逐漸呈現多元而開放的領導模式，增添了橫向關係的不確定性。因此，雙重不確定性的環境使得地方派系產生不斷異質化的驅力，更使得其在地方政治中所呈現的樣態更加不同。為了理解這些不同的樣態，在回顧過去 10 年的地方派系研究後，當前首要之務乃是建立地方派系在

¹ 作者感謝國立政治大學俞振華教授鼓勵而進行撰寫與投稿本文，以及蔡佳泓主任提供許多使本文更加完整的意見。此間亦感謝匿名審查人細心的閱讀與指正，因為他們的建議與指教，才得以讓本文完成。然本文的任何錯誤與不足之處，由作者自負全責。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生

投稿日期：2015年1月28日；採用日期：2015年8月8日

doi:10.3966/2311505X2015080202003

民主化後，地方派系究竟如何去調適不確定性的存在，使其得以繼續活動、取得利益的理論架構。

關鍵詞：不確定性、民主化、地方派系、社會網絡、恩庇侍從

Uncertainti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Adaption of Local Faction: A Review of Taiwan's Researches of Local Faction

Li-Hong Weng*

Abstract

Taiwan's factional politics has rarely been a core topic for political research. The past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local factions almost always embedded in other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rul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social network, organization mobilization, political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etc.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we may identify two theories to explain Taiwan's factional politics—namely, the patron-client theory and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This study is to classify and review the two theories. In shor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first,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Second, it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wo theories are still upheld in Taiwan after democratization and two times of party alternation.

The patron-client theory argues that the main goal for factions is to maximize economic profits and the formation of factions is based on a top-down process. This kind of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added some uncertainties because factions cannot find a steady agent in the current multi-party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factions is from the bottom to top, under which the network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and maintained by itself. It may lead to the multifactorial and open-minded leadership model after democratization, and may add uncertain factors to the lateral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double uncertainties

* Under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3966/2311505X2015080202003

environment prompts local factions to be heterogeneous and differentiates the modes of local politic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 patterns, this study conclude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construct a new theory that can explain how the local faction act after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figure out how local factions adapt to the uncertainties, keep operating, gain profits, and survive in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Keywords: uncertainty, democratization, local faction, social network, patron-client

壹、前言

在臺灣開始民主化前，地方派系被視為國民黨在地方上的統治動員工具，藉以為此「外來政權」增加統治正當性。因此，在民主化前的臺灣，地方派系的重要性在臺灣政治發展歷程中實不容小覷。

誠如吳重禮（2002）所言：「近十餘年來，我國社會科學界相當熱衷、或者經常被提及的研究主題為何，答案可能是派系政治」，諸多的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均以此做為題材。而在派系政治的研究中，對於地方派系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棟，導致其研究發展上也如同吳乃德認為的「愈來愈細緻繁瑣，愈來愈像新聞報導；第二是高度的重複，許多研究只是用新的地區，蒐集新的材料，只是證明早已有的論點」（王金壽，2004a），而無法突破舊有的理論框架。不過也由於其存在的樣態眾多而難以定於簡單的理論框架，致使地方派系的議題在學界的研究中相當難以取得共識。綜觀過去 20 年的研究發展，對地方派系的研究往往並非以派系政治做為主軸，而是將其鑲嵌於其他議題來研究，諸如威權統治模式、社會網絡、組織動員、政治民主化、政黨運作與競爭等（吳重禮，2002），而其在研究途徑上的分歧不外乎是從對派系的定義、運作模式、目的等問題意識而產生。

縱然如此，過去的研究在途徑上仍可簡略區分為「恩庇侍從」（patron-client）及「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兩種型態。做為文獻評議的本文，將針對此兩種型態的地方派系研究的理論途徑進行區分及回顧，試圖分析臺灣在地方派系研究文獻上的觀點與異同，並進一步討論發展已久的兩種理論途徑，在觀察經歷民主化與兩次政黨輪替後的臺灣是否仍然適用，或有何不足之處？若無，則地方派系的研究又必須深入觀察哪些方向？藉此對於地方派系研究上「愈來愈細緻繁瑣」、「只是證明早已有的論點」此等無法突破舊有理論框架的現況，提出值得後續進一步討論與建構理論的議題，以及值得觀察的方向，但並不試圖提供理論假設的建構。

貳、臺灣地方派系研究的核心途徑

如前所述，臺灣在地方派系的研究上大致可區分為「恩庇侍從」及「社會網絡」兩種途徑（吳重禮，2002，頁 93）。前者如王金壽（1997，2004a，2004b，

2006a, 2006b)、陳明通(1995)、趙永茂(1998)、Wu(1987)等人為主，主要認為地方派系為國民黨在動員上的助力，因而較注重於派系與國民黨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如何藉由政黨給予派系經濟資源，而派系提供政黨政治利益、協助國民黨進行統治權上的鞏固，偏向於經濟學視角的分析；後者則以陳介玄(1994)、Bosco(1992)、Jacobs(1980)為主，分析時偏向解釋地方派系的形成、社會基礎及其意義，甚至是派系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偏向社會學視角的分析。

雖然吳重禮(2002)提出引入美國「機器政治」的研究途徑，進而衡量領導菁英的自利動機，探究派系領袖滿足權力控制的心理動機、瞭解派系的組織利益與領導菁英的個人利益，並分析兩者間的落差。然此途徑至今仍少有深入研究，故在此僅針對文獻與理論均較為足夠的「恩庇侍從」及「社會網絡」兩種途徑提出討論，藉此引發國內學界對於理論薄弱之處有更多的討論。

一、恩庇侍從主義

然而，究竟何為地方派系呢？雖然由於「各地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情況，以及人物性格、作風、遭遇之不一，故派系產生之原因可謂經緯萬端，不能一概而論」(趙永茂，1978)，但以其存在的形式主要可引述陳明通(1995)提出的看法：「派系是一種『二元聯盟』(dyadic alliance)，為達成公部門或準公部門資源取得及分配的集體目標，所建立起來的一套多重人際網絡」。在二元聯盟中，占優勢的稱為「酬庸者」(patron)，而弱勢的一方則為「隨從者」(client)；此種垂直二元結盟關係則被稱之為「恩庇侍從主義」，而這樣的概念必須強調「交換」的重要性。

在臺灣的地方派系研究中，吳乃德(Wu, 1987)為探討恩庇侍從主義的先驅，透過討論國民黨政權做為一外來政權，究竟如何藉由與地方派系建立關係，並鞏固其政權的穩定。吳乃德認為由於國民黨戰敗來臺，為求取穩定而希望抑制組織性活動，卻又想藉由開辦地方選舉來攏絡民眾以獲得統治正當性，於是，國民黨選擇採用「中央—地方分隔的雙重菁英結構」，並進而將其區分為官僚侍從主義及選舉侍從主義兩種型態。然而，不論如何進行定義，此種模式均指涉透過寡占性經濟利益的交換來獲得派系的政治支持及選舉期間的動員、買票。值得注意的是，在國民黨與派系共生的時期，其仍將地方派系侷限於縣市層級，並藉由扶持兩個以上的地方派系來穩固制衡與競爭的機制。根據陳明

通（1995）針對此種作法的歸納發現，當臺灣的地方派系結構愈穩定時，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能力就愈強；反之，當此結構不穩定時，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能力就愈弱。

繼吳乃德的研究之後，朱雲漢（1989）更進一步說明遷臺初期經濟拮据的國民黨政權，是如何透過國家機器的公權力來限制經濟活動，進而創造寡占性的經濟利益與地方派系進行利益交換。² 除此之外，王金壽（1997）更透過深入訪談來觀察國民黨政權如何藉由地方派系的動員及組織化，進行買票機器的運作，對國民黨如何在民主化後，選舉競爭開始出現的狀況下如何藉地方派系進行政治動員以穩固選票。

但在民主化前夕，反對國民黨的勢力開始崛起，加上國民黨於 1972 年實施派系替代政策，藉由培養本土菁英來取代具派系色彩的候選人。雖然在 1980 年後開始減緩削弱地方派系，卻轉而利用黨內初選制度來企圖瓦解地方派系的基層實力。於是，為了維持自身利益及運作，地方派系於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後便開始周旋於國、民兩黨間，此時的國民黨也基於必須倚賴派系贏得選舉的壓力而逐漸放棄削弱地方派系的政策。對國民黨而言，地方派系的存在雖然阻斷其與地方人民的個別連結，但卻又不得不藉由地方派系來穩固其統治的穩定性及正當性。當然，由許多以恩庇侍從主義為出發點，探討國民黨藉由經濟利益的給予來換取政治利益，進而穩固統治正當性的策略確實是成功的（陳明通，1995）。因此，臺灣學界至今針對地方派系的研究雖然主要有「恩庇侍從」及「社會網絡」兩種途徑，但在眾多文獻中不難發現其仍以恩庇侍從的途徑為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主化後，此種國民黨為鞏固威權統治基礎而產生的共生結構使得地方派系亦可滲透、整合至中央，原先的地方派系便亦融入了政黨，而地方派系本身也產生由「依附互惠」到「自主互惠」、「一黨化」到「多黨化」的現象。然而，倘若以恩庇侍從主義的理論來分析，過去的地方派系所求取的乃是經濟利益，這樣的看法所假定的乃是地方派系沒有政黨標籤，而是誰能夠提供符合其利益極大化的條件便支持哪個政黨。但若如同徐永明與陳鴻章（2004）提出的地方派系雖然「選舉效率衰退」但卻「深化於政黨」所言，當派系深化而融入於政黨後，派系得以跨越黨派而獲取利益嗎？倘若可以，派系是一種二元聯盟的說法便不再成立，恩庇侍從的論述也隨之瓦解。並且，具有

² 主要有政府特許的區域性獨占性經濟活動（如農漁會）、省營行庫的特權貸款、省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採購，以及以地方政府公權力換取公共利益（如都市計畫變更地目）等四種型態。

黨派色彩後的地方派系如何在中央高度政黨化的競爭環境中獲取資源？遑論跨越黨派的界線而獲取利益。

二、社會關係網絡

恩庇侍從主義乃是以較為經濟利益取向的視角切入地方派系的觀察，但若是將情境置於社會關係網絡觀察時，又該如何定義？趙永茂（1989）認為，地方派系是地方政治人物以地緣、血緣、宗族或社會關係為基礎，相互聯合以爭取地方政治權力的組合。而陳介玄（1994）則更為細密地定義臺灣地方派系乃依循個人關係所建構的社會實體，其運作過程常透過情感性、文化性與社會性的結合，包括恩怨平衡、地緣與血緣的認同及政治理念的契合。整體而言，此觀點認為，地方派系乃是依循個人關係所建構的社會實體，其運作過程經常藉助於象徵利益、政治及經濟誘因的補強（吳重禮，2002）。根據陳介玄（1994）的深度觀察發現，臺灣地方派系涵蓋了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絡，此三個結構的網絡層級使派系行動者得以有效地動員派系成員與基層選民。

Jacobs（1980）則提出「關係」為臺灣地方派系政治的核心，而關係本身正是社會網絡的呈現形式，其在 Mazu 鄉的個案中發現，在地方上藉由關係所構築出的最大型政治組織正是地方派系。然而，如同蔡明惠（2002）所言，社會關係網絡並非派系自身，而是強化派系的機制，因此派系雖然屬於社會網絡的一種，關係也是構築派系的基礎，但派系的關係卻是透過交換關係——亦即恩庇侍從而來的。

然而，此種研究途徑所面臨的困境為：當地方派系已由原先的情感性結合，逐漸轉變為功利性結合的型態；原先社會性、文化性的結合關係亦轉變為新政經結合的結構時（趙永茂，1996），此種藉由情感性結合的「關係」做為核心，透過情感性、文化性與社會性的結合而運作的社會關係網絡研究途徑，似乎已不足以進一步解釋當前的地方派系運作。更進一步來說，此種研究在假定上所衍生的問題是：隨著社會結構快速轉型，地方派系的基礎將由嚴密與穩定，逐漸走向鬆動與解構（吳重禮，2002）。然在高永光（2000）的研究卻發現，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派系影響力也愈強，這樣的研究結果與一般所認知的都市居民較具自主意識，而且人際關係的互動較鄉村地區更為冷漠與疏離，所以派系影響力在都市地區應低於鄉村地區，反而呈現了與經驗事實上相反的情況。於是，這樣的結果更加支持了社會網絡的途徑在研究地方派系上的不足，甚至

如同蔡明惠（2002）所言的社會關係網絡並非派系自身，而是強化派系的機制。

三、民主化後的恩庇侍從及社會網絡途徑還適用嗎？

然而，不論是陳明通或吳乃德等人以恩庇侍從的途徑所切入的地方派系研究，在時間上由於並非如同過往國民黨長期專政，而導致沒有政黨輪替的發生，故能夠以行政上的資源提供地方派系利益以維持恩庇侍從體系的運作。對比於民主化後多黨競爭，且有執政權輪替的現象，顯然在時間序列上的條件已截然不同。

其次，以陳介玄或趙永茂等人研究可知，在空間上的部分，地方的行政層級與組織也逐漸精簡。以過往地方派系活動最為蓬勃的臺中縣市而言，在縣市合併升格後僅剩下臺中市，而以往在臺中縣或臺中市下的鄉鎮等單位，也由區所取代。在行政層級與組織的精簡及涵蓋空間的擴大，地方派系在動員上自然也不見得能如同以往在人際關係較為緊密的行政層級（如村里）來進行。因此，不論是從時間上或空間上的角度來進行觀察，過往兩種臺灣研究地方派系的研究途徑，在民主化後的今日顯然已難以適用。

參、民主化的不確定性與派系的調適

綜上所述，不論是社會關係網絡的途徑難以再解釋社會結構快速轉型，在關係網絡形式已由原先的情感性結合，逐漸轉變為功利性結合的型態；原先社會性、文化性的結合關係亦轉變為新政經結合的結構時（趙永茂，1996），使得此途徑難以解釋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派系影響力也愈強的現象。吾人可以發現社會關係網絡並非構築派系的主要原因，相反地，在功利價值與利益極大化的追求下才建構出地方派系。是以，恩庇侍從的途徑遂成為臺灣過去幾十年來研究地方派系的主要模式。

但隨著民主化的發展，使得過去國民黨與地方派系在威權體制下的恩庇關係難以繼續維繫，此時的地方派系又會如何發展？倘若過去這種地方派系依靠威權政府來取得經濟利益的方式無法存續，加以民主化帶來的政黨競爭及政黨輪替，無疑對於地方派系更是雪上加霜。此時便衍生出兩種在理論層次上尚未被探討的主要議題：首先，民主化本身對於政治制度所帶來的改變如何影響地方派系過去在恩庇侍從體制下所依循的規則？其次，地方派系究竟如何去調適在

侍從主義近乎崩壞下，如何在地方政治或制度中繼續存續的問題。

首先，民主化本身對於政治制度所帶來的改變如何影響地方派系過去在恩庇侍從體制下所依循的規則？換言之，民主化本身對於地方派系的影響在於其對制度與規則的改變，無疑是增加了地方派系在活動上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如王金壽(2004a)針對民主化後國民黨面臨政治市場開放、維持地方派系的經濟利益的成本過高等問題，藉由代理人理論來檢視「沒有反對黨」、「派系內部無競爭」、「可控制的司法」、「全面滲透的情治機關」、「受限的媒體自由」五個過去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採用恩庇侍從主義成功的要件，以及民主化後由於這五項要件的逐步瓦解而使恩庇侍從主義也逐漸衰退。除了這五項要件的瓦解使得國民黨維持侍從主義的成本過高，³加上1992年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使得地方政治人物競逐中央職位的可能性增高，侍從主義可謂近乎崩潰。因此，若要探討當前地方派系的發展，卻缺乏研究影響派系行為的制度及其不確定性所造成的影響，亦難以建立完整的理論架構。

那麼沒有侍從主義為倚靠的地方派系又是如何發展呢？此時便必須面對第二個尚未被提出理論框架的問題：地方派系究竟如何去調適在侍從主義近乎崩壞下，如何在地方政治或制度中繼續存續的問題。雖然王金壽(2004a, 2007)認為，隨著侍從主義的崩壞，地方派系呈現零碎化、山頭化的特性，存亡上岌岌可危。即便民進黨有意進一步與地方派系合作，但缺乏資源分配及處罰等機制的因素也使得這樣的策略難以成功。但王金壽的看法在此留下的疑慮是何謂地方派系的零碎化與山頭化？地方派系又真的終結了嗎？倘若派系沒有終結，那麼當前的派系又是如何進行存續？而根據張佑宗與盧信宏(2014)針對雲林縣自2000年後的地方派系進行個案研究，發現「侍從主義在臺灣社會並不會消失，只是比以前更『零碎化』、『個人化』與『山頭化』而已」。因此，地方派系又是如何在地方政治或制度中存續與調適，在經驗上著實有理論建構的必要性。

根據趙永茂(1996)的看法，地方派系的權力運作模式主要是由寡頭領導，而在民主化後逐漸呈現多元而開放的領導模式，與國民黨原先的依附關係亦逐漸轉變為自主互惠的模式。早期地方派系一黨(國民黨)化的特徵亦轉變為多黨化，也就是說，此時的地方派系著實已由於民主化的不確定性，而找不到其恩庇者，增添了在縱向關係上的不確定性。同時，由於其自主性亦有所提升，更增添了地方派系橫向互動時的不確定性。此外，其更與新興財團(陳東

³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某些地方派系所面臨的成本，亦會由於這些要件的缺乏而較低。但總體而言，其維繫成本較民主化前高已是相對性呈現的客觀現象。

升，1995）、黑道（高永光，2004）等勢力進一步結合，成為「多元分贓的共生結構」（趙永茂，1996），仍舊對地方上的社會資源、選舉動員與提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藉由徐永明與陳鴻章（2004）所提出的檢證可以發現，臺灣的地方派系可謂「衰退卻深化」。雖然地方派系由於國民黨有意進行削弱的策略，而在1990年代有所衰退，動員上亦不如先前來的有效，但地方派系在國民黨中所扮演的角色仍舊重要，呈現出雖然「選舉效率衰退」但卻「深化於政黨」的現象。如此說來，地方派系真的衰退甚至終結了嗎？抑或是深化於政黨中而難以分辨地方派系與政黨？從以上種種文獻的經驗事實檢證看來，各種理論上的不足之處顯示了當前更必須要建構出跳脫恩庇侍從或社會網絡的理論架構，來檢驗地方派系與政黨間的競合關係，或謂地方派系在民主化後如何在制度中進行調適。據此，依循前述民主化造成制度的不確定性而導致派系行為模式改變，進而產生了派系自身如何調適不確定性，更是一項值得建構的理論框架。

肆、地方派系研究的展望：調適理論的初步觀察

在民主化造成制度的不確定性而導致派系行為模式改變，進而產生了派系自身如何調適不確定性，此時需要的是一套適用於今日的理论框架或觀察方向來探討地方派系的活動。而做為文獻評議的本文在指出這些方向後，也將試圖提出未來研究地方派系的方向，主要可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在定義上，吾人將如何定義今日的地方派系？今日的地方派系與過往是相同的嗎？是否因民主化的進程而產生質變？其次，在分析架構上，該以何種方式或歸類來探索今日的地方派系較為合適？將是本文所欲指出的要旨。

首先，在定義上，陳明通（1995）或陳介玄（1994）等人，均是先定義地方派系為何後才開始對地方派系進行研究，而王金壽（1997）或Wu（1987）等學者則未對於地方派系進行特定的定義來研究，其反而是將地方派系視為準團體性質的政治團體來進行觀察。⁴然而，不論前述學者是否對於地方派系有足夠的定義或區辨方式來進行研究，在民主化後的今日，地方派系是否仍與過往相同？抑或因民主化的進程而產生質變？或者根據張佑宗與盧信宏（2014）針對雲林縣自2000年後的地方派系進行個案研究，發現「侍從主義在臺灣社會並

⁴ 感謝審查人對於地方派系的定義問題提出必須重新檢視的意見，筆者於此文中援引該意見做為未來發展理論的方向之一。

不會消失，只是比以前更『零碎化』、『個人化』與『山頭化』而已」，當地方派系已經更加零碎化的同時，非但沒有共同的行動，甚至是互相對抗而試圖取得利益時，此時對於地方派系真的還能指稱是過去研究下所指的地方派系嗎？因此，當前所有研究者幾乎沒有回答這項問題的同時，若試圖觀察地方派系如何進行在制度中存續的調適時，必然要重新審視定義上的問題。

其次，如同徐永明與陳鴻章（2004）所提出的檢證指出地方派系的「選舉效率衰退」但卻「深化於政黨」的現象，因而在今日值得觀察的分析架構，則可以區別為地方派系是否具有政黨背景？而地方派系自身是滲入中央取得執政權？抑或是留守於地方以其他方式維持自身存續？而政黨背景的有無是否對於地方派系在中央或地方的調適方式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綜上所述，當前對於調適理論的建構主要有幾個方向來進行（如表1所示）：首先是最初步的定義問題，以釐清今日所探究的地方派系究竟具有或必須要具有何種特質；其次，在實證研究上的分析架構則是分別觀察地方派系是否具有政黨背景，而對於其滲入中央參與執政或留守於地方是否會有所影響？而滲入中央參與執政與留守地方的地方派系有何不同的特質或方式來存續？則是未來發展調適理論的初步觀察方向。

表 1
調適理論的觀察架構

政黨背景有無	滲入中央—留守地方	
	滲入中央	留守地方
有政黨背景	有政黨背景—滲入中央	有政黨背景—留守地方
無政黨背景	無政黨背景—滲入中央	無政黨背景—留守地方

伍、結論

如同先前所回顧的文獻，過去多年來臺灣在地方派系議題的研究上，不外乎是從「恩庇侍從主義」研究地方派系，認為派系的形成係「由上而下」，並為了其利益極大化而存在；其次則是以「社會關係網絡」來解釋地方派系的形成，認為派系的發展係「由下而上」，並是建構與維繫此一關係網絡而存在。

然而，當地方派系已由原先的情感性結合，逐漸轉變為功利性結合的型態；原先社會性、文化性的結合關係亦轉變為新政經結合的結構時（趙永茂，

1996)，此種藉由情感性結合的「關係」做為核心的社會關係網絡研究途徑，似乎已不足以進一步解釋當前的地方派系運作。社會關係網絡著實非派系自身，而是強化派系的機制。故吾人以為在此種途徑上應試圖建構關係網絡「如何」來強化地方派系的理論，而非認為社會關係網絡即是派系本身，並將對社會關係網絡的建構過程視為派系的產生過程。

其次，雖然王金壽（2004a）曾提出國民黨侍從主義的崩潰，以及派系呈現零碎化、山頭化的特性，存亡上岌岌可危的論述，但從這樣先驅性的研究可以發現，當前仍缺少探討民主化本身對於政治制度所帶來的改變如何影響地方派系過去在恩庇侍從體制下所依循的規則？以及其如何適應從過去的穩定到當前必須面臨競爭的不確定性？但地方派系與新興財團、黑道等勢力進一步結合，成為「多元分贓的共生結構」（趙永茂，1996），仍舊對地方上的社會資源、選舉動員與提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似乎亦瓦解了地方派系岌岌可危的論述。地方派系雖然在地方上呈現零碎化與山頭化的現象，那麼隨著民主化而整合至中央的地方派系呢？以多元分贓的共生結構所存在卻難以辨認的地方派系呢？而這些議題皆關乎於地方派系如何去調適不確定性的存在，使其得以繼續活動、取得利益的問題。

最後，民主化後也使得地方派系亦可滲透、整合至中央，原先的地方派系便亦融入了政黨，而地方派系本身也產生由「依附互惠」到「自主互惠」、「一黨化」到「多黨化」的現象。然而，倘若以恩庇侍從主義的理論來分析，過去的地方派系所求取的乃是經濟利益，這樣的看法所假定的乃是地方派系沒有政黨標籤，而是誰能夠提供符合其利益極大化的條件便支持哪個政黨。但若如同徐永明與陳鴻章（2004）提出的地方派系雖然「選舉效率衰退」但卻「深化於政黨」所言，當派系深化而融入於政黨後，派系得以跨越黨派而獲取利益嗎？倘若可以，派系是一種二元聯盟的說法便不再成立，恩庇侍從的論述也隨之瓦解。並且，具有黨派色彩後的地方派系如何在中央高度政黨化的競爭環境中獲取資源？種種關於地方派系仍舊持續運作的經驗檢證明顯地證實了地方派系在民主化後，確實仍以某種方式來維繫自身的存續及利益取得，而這樣的存續方式卻在汗牛充棟的地方派系研究中難以尋得，也因而成為理解當前地方派系活動所必須處理的主要課題。

綜言之，過去「恩庇侍從主義」認為，派系的形成係「由上而下」，並為了其利益極大化而存在，此種縱向關係著實已在多黨化的政黨政治競爭中，由於派系難以找到穩定代理人的情況下增添了諸多的不確定性；「社會關係網絡」則

認為，派系的發展係「由下而上」，並是建構與維繫此一關係網絡而存在。這樣的觀點卻也在地方派系的權力運作模式在民主化後逐漸呈現多元而開放的領導模式（趙永茂，1996），增添了橫向關係的不確定性。於是，雙重不確定性的環境使得地方派系產生不斷異質化的原因，更使得其在地方政治中所呈現的樣態更加不同。為了理解這些不同的呈現與行為模式，在理論上更亟需建構一套地方派系如何調適不確定性的理論。

本文的定位仍是歸納多年來臺灣在地方派系研究文獻的文獻評議，期望提出在地方派系上尚未被研究的理論框架，藉此提供學界在研究發展上的參考。因此，在回顧過去 10 年關於地方派系的研究後，當前的首要之務乃是建立地方派系在民主化後侍從主義近乎崩壞下，如何去調適不確定性的存在，使其得以繼續活動、取得利益，以及如何在制度中存續的理論架構，即是當前研究地方派系的理論所必須加以考量的。而當前對於調適理論的建構主要有幾個方向來進行：首先是最初步的定義問題，以釐清今日所探究的地方派系究竟具有或必須要具有何種特質；其次，在實證研究上的分析架構則是分別觀察地方派系是否具有政黨背景，而對於其滲入中央參與執政或留守於地方是否會有所影響？而滲入中央參與執政與留守地方的地方派系有何不同的特質或方式來存續？則是未來發展調適理論的初步觀察方向。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金壽（1997）。國民黨候選人買票機器的建立與運作：一九九三年風芒縣選舉的個案研究。《臺灣政治學刊》，2（1），3-62。
- 王金壽（2004a）。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縣為例。《臺灣社會學》，7，177-207。
- 王金壽（2004b）。重返風芒縣：國民黨選舉機器的成功與失敗。《臺灣政治學刊》，8（1），99-146。
- 王金壽（2006a）。臺灣侍從主義時代的結束。《當代》，227，26-37。
- 王金壽（2006b）。臺灣的司法獨立改革與國民黨侍從主義的崩潰。《臺灣政治學刊》，10（1），103-162。
- 王金壽（2007）。政治市場開放與地方派系的瓦解。《選舉研究》，14（2），25-51。
- 朱雲漢（1989）。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載於蕭新煌、吳忠吉、朱雲漢（主編），《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經分析》（頁 139-160）。臺北市：臺灣研究基金會。
- 吳重禮（2002）。臺灣地區「派系政治」研究文獻的爭議：美國「機器政治」分析途徑的啟示。《政治科學論叢》，17，81-106。
- 高永光（2000）。「城鄉差距」與「地方派系影響力」之研究：1998年臺北縣縣議員與鄉鎮市長選舉的個案分析。《選舉研究》，7（1），53-85。
- 高永光（2004）。臺北縣地方派系與黑道互動模式之研究。《選舉研究》，11（1），33-72。
- 張佑宗、盧信宏（2014）。總統選舉、國家認同與侍從主義的消失？2000年後雲林縣的個案研究。《政治科學論叢》，61，1-40。
- 徐永明、陳鴻章（2004）。地方派系與國民黨：衰退還是深化？《臺灣社會學》，8，193-228。
- 陳介玄（1994，4月）。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臺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地方社會與地方政治」專題研討會，東海大學，臺中市。
-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市：月旦。
- 陳東升（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臺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臺

北市：巨流。

趙永茂（1978）。臺灣地方派系與地方建設之關係。高雄市：德馨。

趙永茂（1989）。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一個概念架構的分析。中山社會科學季刊，4（3），58-70。

趙永茂（1996）。臺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政治科學論叢，7，39-55。

趙永茂（1998）。臺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臺北市：翰蘆。

蔡明惠（2002）。戰後澎湖地方派系興衰之研究。選舉研究，9（1），113-136。

二、外文部分

Bosco, J. (1992). Taiwan factions: Guanxi, patronage, and the state in local politics. *Ethnology*, 68(2), 157-183.

Jacobs, J. B. (1980). *Local politics in a rural Chinese cultural setting: A field study of Mazu Township, Taiwan*. Canberra, Australi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u, N.-T.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